

# 怀念戴春洲先生

熊传铭<sup>†</sup>

(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武汉 430072)



戴春洲教授(1907—1972)

戴春洲(1907—1972)先生,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,是一位半导体物理学家,中共武汉大学党委委员,湖北省暨武汉市物理学会理事长。曾三度担任武汉大学物理系主任。2007年是他诞辰100周年,逝世35周年,谨以此文表达对这位博学多识、德高望重的老师的怀念、追思与敬仰。

戴春洲先生,江苏省邳县人,家在戴场村。自幼生长在农家,祖父母是纯粹的农民,一生从事农业劳动。父辈兄弟二人,春洲先生的父亲戴士泽居长,叔父名叫戴士才。祖父鉴于自己不识字的痛苦,努力令自己的孩子读书。因为家庭经济困难,只能供春洲先生的父亲读书,而叔父读书却很少,毕生从事农业劳动。父亲戴士泽字润生,年少时先在邻村私塾学习,曾在前清末年应县试不中。稍后清廷废科举、兴学校(当时称洋学堂),父亲戴士泽考入徐州师范学校学习。在临近毕业考试之际,终因身体不适,请假回家,调养数年才略见好转。春洲先生的母亲不识字,一生从事家庭和农业劳动。父母双亲在解放初先后在家乡病逝。

清光绪三十三年(丁未,1907)年,戴春洲出生时,父亲在徐州师范学校学习。春洲先生兄弟四人,他本人行二,上有一兄长叫戴春赢,下面还有两个弟弟。从他三四岁起,兄弟二人就跟随在家养病的父亲识字。后来有两年父亲应聘到外村教私塾,他亦跟随去学习。学习内容就从当时的小学语文开蒙,稍后就读四书、五经和一些古文。再后来为了准备进学校,又读了些小学史、地课本,学了点算术中的加、减、乘、除。春洲先生小时身体很健康,天资聪颖,学习很用功,很听大人的话,家人和亲友都很喜欢他。

1917年,父亲带他进县城以同等学力报考县立

第一高等小学,发榜时名列第一,家人亲友听到后都很高兴。当年春洲年仅十岁,从农村到县城只能寄宿读书,家人放心不下,加之家中经济也困难,无力支付较大的寄宿费用,实际未能入学。次年秋,县立第一高小增招,父亲令春赢、春洲兄弟二人去县城读书之外,又鼓励好几位亲邻一道去,组织起七八个人以走读生入学,生活用费要比寄宿生少很多。就是这样家里仍感经济困难。过了半年后,县里又开办一所简易师范学校时,父亲就叫大哥春赢去师范学校读书,为的是从师范学校毕业后,容易找到工作。实际上春赢毕业后,一直在本县各小学任教,用教书得到的酬金贴补家用。春洲后来读大学的学习费用,大哥也有许多帮助。春洲先生入高小后,他的学习成绩进步很大,对各门功课都很喜欢。1921年毕业时又名列全校第一,老师和同学对他寄以很大的希望。

高小毕业后,他随着一位周老师(淮阴人)到淮阴,考入了江苏省立第六师范学校,食宿皆由学校供给,费用较省,但校规异常严格,功课甚紧。因此他更专心于各门功课的学习,成绩一直很好。师范学习前期不分科,课外读过老庄、荀卿的著作,对他以后的思想发展有一定的影响。当时认为祖国贫弱是由于科学不发达,产生了专心攻习科学的想法。到师范分科时,就选修了理科,把学习的重点放在数理化学上。1926年6月师范毕业,在兵慌马乱中他回到家乡,仍想继续深造。即使家庭经济困难,他还是想要考大学。当时听说清华大学招生,便将证件寄去报了名。后来因为打仗,铁路不通,未能参加考试。那年秋季,应聘于邳县县立第一高小任教员,教算术、地理、自然等课。

县立第一高小开学上课仅一个多月,料想不到的事故发生了。一天黎明,邳县县城突然被土匪侵占,四处枪声齐发,春洲与其他住校师生数十人,在慌乱不明的情况中全被土匪掳去。他们在匪窟中居留了半个多月,实际就是绑票,精神上倍受威胁。家

2007-11-14 收到

<sup>†</sup> Email: txpan@whu.edu.cn

人被迫用了二百多元现洋才将他赎回。当时家中并无余款，这二百多元现大洋，全部都是由亲戚朋友转借的。为了还债不得不把家里仅有的少数土地卖出六七亩，这更增加了家庭的困难。没过许久，小学又复学了。教学工作维持到寒假，聘用期满，他就又离职回家。1928年3月，这时春洲先生刚满21岁，县教育局委任他担任邳县土山镇小学校长。他到土山镇小学校去了一趟，看了看当地的情况和小学的现状，感到没有希望。只在土山镇住了一宿，就拂袖而去，把委任状原封不动的退还给县教育局。

1928年7月，家里设法凑齐了一点旅费，他先到南京，在一位同乡家借住，准备报考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。那时大学入学考试分两场进行，第一场考几门重要功课，停几天出第一榜，榜上有名的再考第二场。他考完第一场后，立即赶到上海，报考上海劳动大学。因为想到中央大学费用大，考取了也不易入学。而劳动大学收费较少，若能考取劳动大学，入学的希望较大。在考过劳动大学第一场后，不愿放弃机会，又赶回南京参加中央大学的第二场考试。考完后，得悉上海劳动大学第一榜也考取了。当时旅费差不多已经用完，就决定放弃劳动大学第二场的考试。向同乡借了一点钱回家。约过了一个多月，由报载知道，已经正式考取了中央大学。当时真是又喜又忧：通过考试得到升学机会，是件很不容易的事，可说是一喜，而入学的费用很大，点金乏术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又是一忧。苦等多日，一无头绪。他也曾向县教育局请求过帮助或借助，全遭拒绝。当时闷坐斗室，了无乐趣。赴学报到日期临近，只得请先行者到校代他请假数日，以便另想别的办法。

最后在限期届满时，靠那些贫穷的邻居和叔伯兄弟，三元两元的凑在一起借给他，让他暂时先入了学再讲。人们看他还有培养前途，看到他的困难就忘记自己的困难。凑够了用费，春洲去到学校报到入学后，深感求学机会之难得。除省吃俭用外，日夜勤奋学习。清晨黎明即起，晚上午夜前很少入睡。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朦胧想法，在知识海洋汲取营养。他刻苦努力，勤勉学习，不但勤于读，而且善于记，每有心得，便见诸笔端。原以为读个一年半载就罢休的，想不到经过全家人的省吃俭用，热情劳动的支持，许多亲邻的鼓励，父亲和大哥在小学教书，这样一年两年地坚持下来，终于一口气读完了大学，最终连他自己也感到惊奇。他整个读大学的时期，也是家庭中最艰苦的时期。为了支撑他上大学，大哥也曾肩背粗布沿街叫卖，两个弟弟在农忙时，曾给别人打过短工。

1932年底，春洲先生25岁，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。为了谋生，先就职于南京私立安徽中学，聘用期半年，1933年2月到8月。紧接着又转到开封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员，合同期三年：1933年8月到1936年7月。当时教书的薪金，除留下最低生活费外，全部都寄回家去，以便缓解家庭的经济困境。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，经朋友介绍，1936年8月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任助教。当时计划着一方面工作，一方面加紧自学，等有机会时出国留学（1933年夏曾在南京报考清华留美考试，未被录取）。不料刚过一年，“七七”事变发生，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1938年春，随武汉大学迁去四川乐山。据有关报道，当时去乐山的学生有600人，教职工约200人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在乐山任教期间，春洲先生尽职尽责，努力搞好本职工作。他的表现以及他后来的工作业绩和人格魅力，为曾担任过武汉大学物理系行政负责人的查谦与桂质廷所赏识。

我们从现在武汉大学物理大楼一楼门厅内公布资料可知，从1936年到1953年的十七年间，物理系的行政负责人中，桂质廷任职六年，查谦任职（三年加六年）九年。到1953年全国院系大调整，查谦被调到华中工学院，武汉大学物理系的行政领导职务，如同赛跑的接力棒一般，戴春洲接替查先生任物理系主任。是年，全国高校开始全面学习苏联，百废待兴，戴先生团结全系教师，艰苦奋斗，完成各项工作任务，使物理系各方面得以提高。从普通物理开始，全面采用苏联教材，戴先生组织教师以教研室为基础，先学好新教材，相互切磋，以保证教学质量。理论课变化大，原来一门理论物理课扩展为理论力学、统计物理、电动力学和量子力学。除理论力学原已开设之外，其余三门都属新课，系领导安排周如松、梁百先两位教授及戴先生分别担任后三门课的教学准备工作，他们对55届同学首次开出了这三门课。数学物理方法是全新的课程，系里派林应茂老师赴北京大学进修，回校后在物理系首次开出。

解放初期，学生人数逐年增长，实验室任务十分繁重。学习苏联，实验内容要更新，个数要增加，学生人数增加，仪器的套数也要增加，实验室面对学生的时间大大增加。如何使用有限的经费和实验室有限的空间，以及有限的青年教师人数等都成了问题。戴先生及实验室负责的老师煞费苦心，只有用扩建实验室的办法来加以解决。在扩建实验室的过程中，李子高师傅负责金工室功不可没，他们按照老师的要求，设计、生产了不少新实验仪器，仿造了一些旧仪

器以增加仪器的套数. 当时很多实验仪器是购买不到的, 就靠物理系的小“金工室”加工制造. 1954年前后,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、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教授来武汉大学物理系实验室参观, 还参观了学生的实验课. 参观后他称赞道: “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, 将实验扩充到这种水平, 真不容易”.

现在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二楼, 厅廊上悬挂有5张照片, 他们都曾为武汉大学物理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. 他们分别是查谦、桂质廷、戴春洲、周如松和梁百先.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, 在武汉大学物理系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中, 戴春洲先生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.

1958年, 春洲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. 此后, 即使他不担任行政职务, 在共产党内他还有党内职务——分配他做老教授们的思想工作, 团结他们一道前进. 在他担任系主任期间, 团结周如松、梁百先、毕长林、刘云山、李鼎初等教授一道工作. 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引进人才, 重视物理系的理论与实验室建设, 十分重视专门化的建设和发展: 1954年, 桂质廷教授和梁百先教授筹建国内高等学校第一个“电离层与电波传播专门化”; 周如松教授领导创建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门化; 他经手引荐王治梁教授和张承修教授来武汉大学, 组织筹办了理论物理专业, 戴春洲曾一度专门去北京进修, 1958年领导创建了半导体专业. 关于本科生的课程建设, 我向几位学兄询问他们听课的情况. 正是在戴先生担任系主任期间, 物理系从1953年到1956年, 新增或加强四大力学授课的师资力量. 理论力学由毕长林、熊吟涛教授讲授, 电动力学由梁百先教授讲授, 数学物理方法由林应茂教授讲授,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由周如松、张承修教授讲授, 量子力学由戴春洲、王治梁教授讲授.

戴春洲先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教授, 并以其严谨、认真的学风影响了物理系的一代青年. 他为人处世十分谦虚谨慎, 注意团结, 不事张扬. 在物理系众多的老教授中间, 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出国留学, 或

许他感到是一种不足. 为写此文, 我向王燊教授讨教. 他对我讲: 他是1940—1944年在四川乐山读的武汉大学物理系. 他读书时, 戴先生教他的“无线电”课, 用的是英文教材. 戴先生先让同学们自学一段内容, 弄清书上的疑点和难点后, 再来听老师讲解. 戴先生很注意学生的接受程度, 培养学生们的自学能力. 王燊教授毕业后留校工作, 被安排教普通物理, 并同毕长林、戴春洲一道钻研如何教好普通物理, 留意改进教学方法. 那时同事们见面, 十之八九大家都是讨论如何把课教好. 他们还总结过教学经验, 在全校做过经验介绍. 在1953年院校调整时, 领导曾把王燊教授等三人从武汉大学调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, 这样将会影响到“电离层与电波传播”方面的工作. 戴春洲当时是系主任, 他从工作出发, 乘教育部长来校视查的机会, 直接提出意见, 要求把王燊教授调回来. 后来, 果然把王燊教授调回来了, 这对桂质廷教授领导创立的“游离层实验室”的工作, 是一个有力的支持.

我们几个青年人是武汉大学物理系1958届的毕业生, 毕业后就在戴春洲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. 物理系主任的职务, 戴春洲教授已请王治梁先生担任, 他本人任半导体教研室主任. 半导体教研室的实验、教学、科研各个方面, 一切从零开始, 无论巨细, 他都亲自过问. 在半导体教研室成立之初, 真有不少压力. 在戴春洲教授的领导下, 克服困难、团结一致, 勇往直前. 除此之外, 他还兼任湖北省暨武汉市物理学会理事长, 湖北省第四届、第五届政协委员等职. 这些社会工作, 不论份内份外, 他都兢兢业业, 一丝不苟, 努力做好.

不幸的是, 在他第三次担任物理系主任期间, 突发重病, 医治无效, 于1972年11月21日与世长辞. 戴春洲先生的逝世, 是武汉大学物理系的一大损失. 他的音容笑貌, 永远驻留在我们心间. 人们永远怀念铭记着这位可敬可佩的长者, 他的敬业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.